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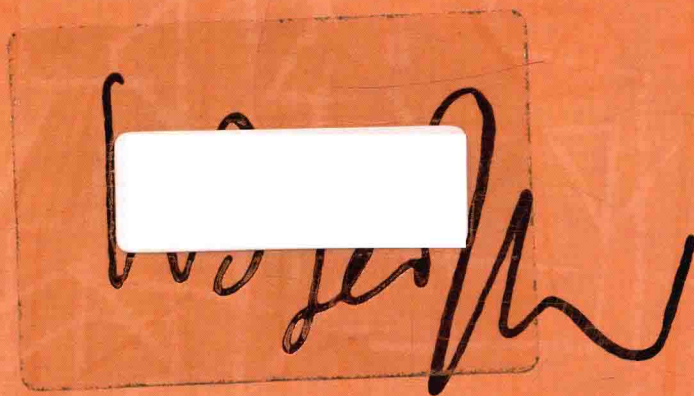
人，岁月，生活

上

[苏联] 伊利亚·爱伦堡 著

王金陵 冯南江 译

ЛЮДИ
ГОДЫ
ЖИЗНЬ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岁月，生活

上



[苏联] 伊利亚·爱伦堡 著

王金陵 冯南江 译

ЛЮДИ
ГОДЫ
ЖИЗНЬ

И. А. Ильин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3-2541

И. Г. ЭРЕНБУРГ

ЛЮДИ, ГОДЫ, ЖИЗНЬ

И. Г. ЭРЕНБУРГ,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ДЕВЯТИ ТОМАХ,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ОСКВА. 1966, 1967.

本作品经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获得专有版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 岁月, 生活: 全 2 册/(苏)爱伦堡著; 王金陵, 冯南江, 秦顺新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ISBN 978-7-02-010215-0

I. ①人… II. ①爱…②王…③冯…④秦… III. ①回忆录—苏联—现代 IV. ①I5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5123 号

责任编辑 张福生

装帧设计 柳 泉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固安县铭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376 千字

开 本 68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89.75 插页 5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215-0

定 价 138.00 元(上、下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二部	225
第三部	419
第四部	653
第五部	923
第六部	1121
译后记	1429

第一部

王金陵 冯南江 译

我早就想把我生平遇到过的一些人、我所参与或目睹的一些事写出来；但我一次又一次地把这个工作搁置下来：或为情势所阻，或因心中犹豫——我能否成功地再现那些因年深日久而逐渐暗淡了的人物形象呢？自己的记忆又是否可靠呢？如今再也不能因循拖延，我终于坐下来写这本书了。

三十五年前，我曾在一篇游记中写道：“今年夏天，在阿布拉姆采沃，我眺望着园中的几棵槭树和几张安乐椅。想当年阿克萨科夫有足够的时间去思索一切。他和果戈理的往来书简对心灵和时代作了从容不迫的勾画。而我们将在身后留下什么呢？无非是一张张的收据：‘今收到一百卢布’（签名）。我们既无槭树，又无安乐椅，只不过是经过在编辑部里和贵宾席上那一阵阵使人精神空虚的瞎忙之后，在火车单间里或甲板上休息一下罢了。这大概也有它的道理。如今时代宛若一辆高速汽车，对汽车不能大喝一声：‘停下，我要仔细看看你！’只能谈谈它的前灯一闪而过的亮光。只能不知不觉地落在它的车轮底下，——这倒也是一条出路。”

我的许多同龄人都陷在时代的车轮下了。我所以能幸免，并非由于我比较坚强，或是较有远见，而是因为常有这种时候：人的命运并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局象棋，而是像抽彩。

很久以前我就说过，我们的时代没有留下许多生动的记载，看来我说对了：很少有人写日记，书信也写得简短、讲求实际——“我活着，还健康”；回忆录也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我只提出其中也许不是所有的人都了解的一点：我们为了要好好思索一下我们的过去，却过分频繁地和它发生争执。在半世纪内，多次变更对人对事的评价。完整的语句说了一半便戛

然而止；思想和情感不由自主地屈服于环境的影响。人们得从荒野里走出一条路来；有的人从悬崖上跌落，向下滑去，挂在枯树多刺的枝丫上。健忘有时是出于自卫的本能，因为怀着对往昔的记忆是不能前进的，它捆住了双足。我儿时就听说过这么一句谚语：“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后来我又深信，这个世纪太艰辛了，所以不能背上回忆的包袱。甚至连两次世界大战这样震撼各民族的大事件，都很快变成了历史烟云。世界各国的出版家们如今都说：“谈论战争的书现在不吃香了……”对于过去的事，有些人已记不得了，另一些人又不想知道。大家都朝前看，这当然很好，但古罗马人崇拜雅努斯^①并非毫无缘由。雅努斯有两副面孔，倒不是因为他是人们常说的那种两面派，不，他是睿智的：它的一副面孔回顾过去，另一副瞻望未来。雅努斯庙只有在和平的年代才关闭，而在一千年间只关过九次——和平在罗马是极为罕见的事。我这一辈人虽然不像罗马人，但我们所度过的多少还算得上平静的岁月也是屈指可数的啊。不过看来和罗马人不同，我们认为，只有在完全的和平年代才宜于缅怀过去……

当目击者沉默的时候，野史奇谈便应运而生。我们有时说：“攻打巴士底狱”，虽然谁也没有去攻打巴士底狱——1789年7月14日只不过是法国大革命的许多事件中的一件而已；巴黎人轻而易举地进入了监狱，原来那儿只关了很少几名囚犯。然而正是攻打巴士底狱的那天成了共和国的国庆节。

流传到下一代人耳目中的作家的形象是真真假假的，有时和实际情况完全相反。直到不久以前，司汤达在读者的心目中还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也就是说，是一个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心境的人，虽然他是平易近人的，而且憎恨利己主义。人们通常认为，屠格涅夫喜爱法国，因为他在那儿度过了许多岁月，又和福楼拜相契；事实上，他并不了解，也不大喜欢法国人。有些人认为左拉是一个熟知各种诱惑的人，因为他是《娜娜》的作者；另一些人却回想起他在为德雷福斯^②辩护时所起的作用，因而认为他是一个社会活动家、热情的政论家；但是这位肥胖的眷恋家室的人却是异乎寻常地贞洁，而且除

① 雅努斯是罗马神话中的门神。

② 德雷福斯是19世纪末法国总参谋部一名犹太血统的军官，曾被诬告为德国间谍。

了晚年之外，他一直置身于那震撼法兰西大地的内战风暴之外。

每逢我路过高尔基大街，总要看见一个十分傲慢的人的青铜铸像，而我都感到十分惊讶，这竟是马雅可夫斯基的纪念像，它跟我所认识的那个人是多么不同啊。

从前，传奇性的人物形象，往往需要几十年，有时甚至几个世纪才能形成；而现在，不仅飞机可以迅速地掠过大洋，人也能在瞬息之间脱离大地，忘却熙熙攘攘、陵谷错综的花花世界。我有时觉得，在我们这个世纪的下半叶几乎是普遍存在的文学上的某种衰退，跟昨天的现实迅速转变为社会习俗有关。作家很少描写实际存在的人——某某伊万诺夫、杜朗或史密斯；小说的主人公是合金，其中既有作家遇到的许多人，又有他自己的内心体验，还有他对世界的理解。也许，历史就是一位小说家？也许，活生生的人们对它来说便是原型，而它，把这些原型加以熔炼，然后写成一部部好的或是不好的小说？……

大家都知道，目击者们对某一事件的叙述，常常是极其矛盾的。无论证人有多么善良，归根结底，法官们在多数场合下，总还是应该信赖自己的洞察力。回忆录的作者们再三声称，他们是在不偏不倚地描述时代，但几乎总是在描述自己。幸亏司汤达留有日记，否则，如果我们相信司汤达的密友梅里美所塑造的司汤达的形象，那么我们就永远也不会理解，一个具有上流社会风度的、敏锐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怎能描绘出人的巨大激情。雨果、赫尔岑和屠格涅夫都描绘过 1848 年 5 月 15 日巴黎爆发的政治风暴；但当我阅读他们的札记时，我却觉得他们所写的是不同的事件。

这种记述的不一致，有时是思想感情的不同所致，有时却与那习以为常的健忘有关。契诃夫死后才十年，那些熟悉安东·帕夫洛维奇的人就在争论，他的眼睛到底是什么颜色——是褐色的、灰色的，还是天蓝色的。

记忆力通常是保存了一些东西，而放过了另一些东西。我对童年时代、少年时代某些场景的细节至今记忆犹新，虽然它们绝不是什么最重要的东西；我记得某些人，但把另一些人忘得干干净净。记忆力像是汽车的前灯，在黑夜里，它们忽而照亮一棵树，忽而照亮一个岗棚，忽而又照亮了一个人。人们，特别是作家们，在他们合乎逻辑地、详尽地叙述自己生平的时候，经常用臆度揣测来填补空白，使人难以辨别，他的真实回忆在哪儿结束，虚构的

小说又从哪儿开始。

我不准备有条理地叙述过去——我厌恶把真实的往事和虚构搅和在一起；何况我已经写了许多部小说，在这些小说里，个人的回忆已成为各式各样臆测的素材。我将叙述一些个别的人，叙述各个不同的年代，杂以某些未能淡忘的对昔日的见解。看来，这将是一本写自己多于写时代的书。当然，我将谈到我认识的许多人，——政治活动家、作家、艺术家、幻想家、冒险家；他们之中某些人的名字是人所共知的，但我不是不偏不倚的编年史家，所以这只是绘制肖像的尝试。而且那些事件，不论是大事还是小事，我也试着不去按照历史的顺序叙述，而是结合着我渺小的一生，结合着我今天的想法来叙述。

我从不写日记。过去的生活很不安定，因而我也没能把朋友们的书柬保存下来——法西斯占领巴黎的时候，我不得不焚烧了几百封信；后来毁掉的信也比保存下来的要多。1936年，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给成年人读的书》；它跟我的其他小说不同，其中有几章具有回忆录性质。我将从这本旧作里摘取某些材料。

某些章节，我认为发表得过早了些，因为它们谈的是尚在人世的人，或是还未成为历史财富的事件；我将尽力不做任何有意识的歪曲——忘却小说家的手艺。

石头总是冷的，按其本质来说，与人体是不同的，可是自远古时代起，雕塑家就用大理石、花岗岩甚至是金属——青铜——来表现人。只有在他们眼前浮现了美丽的构思时，他们才采用木头，虽然木头更接近于肉体。石头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因为它更难于雕琢，而且它能长期保存。在各种博物馆里，竖立着一行行石像；其中有许多精美绝伦，但却都是冰冷的。不过有的时候，雕像在参观博物馆的人们眼中变得温暖起来，充满生机了。我但愿能用满含挚爱的双目使往昔的某些化石充满生机；同时使自己贴近读者：任何一本书都是自白，而写回忆的书籍——这更是一种不愿以虚构人物的影子来掩盖自己的自白。

1891年1月14日,我诞生在基辅。1891年——这是俄国人和法国造酒商难以忘却的一年。当时的俄国正是哀鸿遍野,灾荒毁掉了二十九个省份。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柯罗连科募集捐款,开设粥厂,企图赈济灾民;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杯水车薪,很久以后,人们还把这一年称作“荒年”。法国造酒商却在这一年大发酒财:酷暑毁灭了庄稼,却提高了葡萄的质量;伏尔加河流域农民的凶年必定跟勃艮第和加斯科涅的造酒商的丰年联袂而来;还在我们这个世纪的20年代,鉴赏家们就到处搜罗标有“1891”字样的陈酒。1943年从列宁格勒由“冰道”运到莫斯科一车厢1891年的老牌“圣爱米里昂”酒。酒业公司要求阿·尼·托尔斯泰和我检验一下抢救出来的酒的质地。结果发现瓶子里满盛着微微发酸的水——酒消失了(跟流行的传说恰好相反,酒,哪怕是最上等的,过了四五十年也会消失)。

1891年……现在看来这是多么遥远的年代啊!当时统治俄国的是亚历山大三世。高踞大不列颠王座的是维多利亚女王,她清楚地记得塞瓦斯托波尔的被围、格莱斯顿^①的演说以及对印度的镇压。那时在维也纳顺利执政的是弗兰茨-约瑟夫,他正是在值得纪念的1848年登基的。上一世纪的正剧和闹剧的主人公——俾斯麦、加利费将军、沙皇俄国的著名外交家伊格纳季耶夫、麦克-马洪元帅、由于卡尔·马克思的抨击性小册子而知名于我们大学生中间的福格特尚在人间。当时恩格斯也还活着。巴斯德和谢切

① 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自由党领袖,数度任首相。

诺夫、莫泊桑和魏尔兰、柴可夫斯基和威尔第、易卜生和惠特曼、诺贝尔和路易丝·米歇尔^①都还在工作。1891年兰波和冈察洛夫逝世了。

如果现在想象一下1891年的话,从外表上看,世界的变化如此之大,仿佛逝去的不是人的一生,而是几百年的时光。当时巴黎还没有灯光广告,也没有汽车。人们还把莫斯科叫作“大村庄”。在德国,迷恋菩提树和舒伯特的浪漫派,还在度着自己的风烛残年。而美洲却是那样的遥远。

当时约里奥-居里、费密^②、马雅可夫斯基、布莱希特、艾吕雅都还没有诞生。希特勒才两岁,世界上一片升平气象:没有任何人挑动战争;意大利只不过在端详着埃塞俄比亚,法国在准备攫取马达加斯加。报刊议论着法国舰队访问喀琅施塔得:显然,法俄同盟是针对三国同盟的;爱好议论深奥政治问题的人说,“欧洲的均势拯救了世界”。

俄国仍处于停滞状态。亚历山大三世在粉碎民意党之后,有点放心了。不错,5月1日在彼得堡举行了一次小小的工人游行。不错,列宁在萨马拉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但这些琐事能使全能的沙皇不安吗?当法国军舰来访,军乐队奏起《马赛曲》的时候,他毫不介意地举手行礼。他扬扬自得地说:西伯利亚大铁道已经铺成,不久火车就能由伊尔库茨克直抵莫斯科了……

5月1日是新鲜的。1891年,在法国北部的富尔米工人区,警察开枪射击五一游行队伍。报上写道:“公社社员不祥的影子复活了。”

在德国隆重地建立了“泛日耳曼主义联盟”。那里的人们都在谈论生存空间、德国的使命、日后的远征,未来的党卫军分子的父辈们叫嚷着“万岁”。

饶勒斯^③写道,必将取得胜利的并不是富尔米的刽子手,而是工人们、国际主义者和人权保卫者。

不,1891年并不是那么遥远:当年种下的祸殃,为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无穷的后患。每一个人的生活历程都是曲折而复杂的,但是,当你站在高处俯瞰它的时候,你就能发现,它本身也有着一条潜在的直线。凡是诞生在最

① 米歇尔(1830—1905),法国女革命家,积极参加了巴黎公社,写过一些诗歌和长篇小说。

② 费密(1901—1954),著名的意大利物理学家。

③ 饶勒斯(1859—1914),法国社会党领导人。

平静的1891年——是年俄国闹饥荒，而法国的美味葡萄酒则大丰产——的人们，命中注定要看到许多革命、许多战争、十月革命、地球卫星、凡尔登、斯大林格勒、奥斯维辛、广岛、爱因斯坦、毕加索、卓别林。

1891年1月14日，在基辅的一条从克列夏季克直上里普基的陡峭的学院街上，我来到了人间，就在这一天安东·帕夫洛维奇在由彼得堡寄给他妹妹的信上写道：“我被一种极不明确、我不理解的浓重的恶意气氛所包围。他们给我以午餐，对我唱一些俗气的颂歌，而同时却准备一口吞了我。为了什么？鬼才知道他们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我举枪自杀的话，那将会使十分之九的朋友和崇拜者们大为满意。他们是如何浅薄地表达着自己浅薄的感情啊！布列宁用小品文咒骂我，虽然无论什么报纸都不容许咒骂自己的同事……”而那位布列宁正是这样来议论契诃夫的：“上述平庸的天才们忘记了正视他们周围的生活，一味随波逐流……”安东·帕夫洛维奇是1891年1月开始写中篇小说《决斗》的。我经常重读契诃夫的作品，不久前又把《决斗》读了一遍。当然，这部作品带有时代的烙印。主人公拉耶夫斯基为边远地区的生活所苦，老是幻想着他回彼得堡时的情景：“火车里的乘客在谈着生意啦、新的歌女啦、法俄的修好啦；四处都能感到活跃的、有文化的、有知识的、朝气蓬勃的生活……”可是，不论是法俄亲善还是贸易发展，我不读《决斗》也都知道。我重读这部作品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那就是自己的一生。

拉耶夫斯基——这是一个软弱的人，一个迷惘到绝望地步的人：“他已经把自己那颗昏暗的星星从天空中推了下来；它掉下去，它的踪迹消失在夜晚的黑暗里；它再也不会回到天空，因为生命只有一次，绝不会来第二回。要是他能够挽回过去的岁月，他一定要用真理代替谎言，用工作代替懒惰，用快乐代替烦闷……”一个有着真实的知识，而心地却极不真实的人冯·科连，揭露了自暴自弃的拉耶夫斯基。“他既然改不过来，那就只有一个法子可以使他不能为害……为了人类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应当消灭这种人才对。真应当这样……我并不坚持采用死刑。如果这样做证明是有害的，那就想别的法子也行。要是不能消灭拉耶夫斯基，那么为何不孤立他，使他失去个性，打发他去参加社会工作……如果他骄傲，打算反抗，那就给他套上镣铐！……我们应当亲自关心如何消灭腐化的、没出息的人才对，要

不然,拉耶夫斯基这类人繁殖起来,文明就要灭亡。”而拉耶夫斯基这个可怜虫,却对这位进化和自然淘汰论的无情的拥护者抱着这种看法:“他的理想也是专制的。如果普通人为群众的福利工作,那么他们心里所想的是他们的邻人——我,你,一句话,人。在冯·科连看来,人是狗仔,是废物,太渺小了,不配做他的生活目的。他工作也好,去探险也好,在那边送了命也好,并不是出于对他邻人的爱,而是出于这样一些抽象的概念,如人类啦、未来的子孙啦、理想的人种啦……那么人种又是什么呢?幻想、海市蜃楼……专制暴君素来是幻想家。”

在小说的结尾,拉耶夫斯基,也可以说还有契诃夫本人,眺望着汹涌澎湃的大海思忖着:“海浪把船抛回来了,它进两步,退一步,可是桨手们很倔强,他们不停地划桨,不怕高浪。船一步步地往前走。现在,船看不见了,再过半个钟头,桨手们就会看见轮船上的灯光。一个钟头之后他们就可以靠拢轮船的梯子了。生活里也是这样……寻求真理的人们也是进两步,退一步。痛苦啦、错误啦、对生活的厌倦啦,把他们抛回来,可是寻求真理的热情和顽强的意志会促使他们不断前进。谁知道呢?也许他们终于会达到真理吧。”

我已经说过,契诃夫是在1891年1月开始写《决斗》的。回顾自己的一生,我发现我的思想、希望、怀疑跟我还没有降生时就已激动着安东·帕夫洛维奇的一切是有联系的。我生平遇见过许多冯·科连,我经常迷失方向、犯错误,而且和拉耶夫斯基一样,哀悼过那颗从天上推下来的昏暗的星星,而且也在那个拉耶夫斯基一样,赞叹着跟惊涛骇浪搏斗的桨手们。现在,远方的大陆已成为近郊。月亮也不那么遥远了。但是过去并不因此而失去自己的力量,如果人在一生中几乎像更换衣服似的无数次蜕掉自己的皮,然而心却是无法更换的——心还是那一颗。

俗话说,苹果落地,离树不会太远。有时确是如此,有时却恰恰相反。我生活在经常是按照履历表去判断一个人的时代;报纸上写着:“儿子不对父亲负责”,但有时却不得不对爷爷负责。

也未必能依据孙子们的行为来判断爷爷的是非。前几年,我在《世界报》上读到过一篇谈列·尼·托尔斯泰的孙子们和曾孙们的文章;他们大约有八十个,散居在全世界:一个是美国军官,另一个是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第三个是法国航空公司的经理人。

诗人费特,即阿法纳西·阿法纳西耶维奇·申欣,除了写过不少好诗而外,还在卡特科夫的杂志上发表过一些不好的文章。他揭发虚无主义者和犹太人,说这些人是邪恶的始因。费特的外甥普津告诉我,诗人在去世前不久,从一封信——自己亡母的遗嘱——中得知,他的父亲是汉堡的犹太人。有人告诉我,仿佛费特曾留有遗言,要求把这封信和他葬在一起,大概他想对后代人掩盖有关自己那棵苹果树的真实情况。革命以后,有人开棺找到了这封信。

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回忆道:“我诞生并成长在这样一种氛围内,那儿主宰一切的是打后脑勺、脚踢、吃拳头、挨耳光等等,但是,说老实话,我周围的环境并没有使我养成用拳头打人的嗜好。我从没有打过人。”屠格涅夫把自己的女儿彼拉格雅改名为波林娜,并把她嫁给了玻璃厂厂主加斯通·布留艾尔,他在给安年科夫的信中说:“麻烦事多得数不清,但我得到了酬劳,我完全相信,我的女儿会幸福的。”(随后,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就动笔写《烟》,其中表现了一个已婚妇女的痛苦。)

我现在怀着热爱回忆起我的双亲；但是，回首过去，我不禁发现，苹果滚得离苹果树竟那么远。

我出身于一个资产阶级的犹太人家庭。我母亲珍视许多传统的东西：她在一个笃信宗教的家庭里长大，在这个家庭里，人们都敬畏上帝，不敢直呼其名，他们也敬畏那些只有收到丰盛的祭品才不会索取带血的供物的“神灵”。她时刻不忘上天的最后审判日，也不忘人间蹂躏犹太人的暴行。我的父亲属于力图脱离犹太区的第一代俄国犹太人。祖父因为他进了俄罗斯学校而诅咒他。不过，祖父的脾气一般来说是很暴躁的，所有的儿女都被他一一诅咒过；然而快到暮年时，他明白了时代是反对他的，于是和被诅咒的子女言归于好了。

如果说祖父是苹果树，那么这棵树上所结的苹果却飞向了各个不同的方向。我的一个伯伯发了大财；他叫拉扎尔·格里戈里耶维奇，住在哈尔科夫。他的儿子，我的堂兄伊利亚，是社会民主党人，曾长期被监禁在卢基扬诺夫监狱，后来迁居巴黎，在那儿从事绘画，国内战争时期加入了红军，被白军打死了。拉扎尔的弟弟鲍里斯·格里戈里耶维奇，住在伊尔库茨克，是基辅巨贾布罗茨基某一企业的雇员。鲍里斯·格里戈里耶维奇是个轻佻的人，他盗用了布罗茨基的钱财，潜逃到美国，给主人写了一封信，信的口气挑衅多于求恕。布罗茨基勃然大怒，在许多报纸上登载了悬赏缉拿的告示。我当时正在巴黎，那些幻想借追捕在逃的爱伦堡而发一笔横财的人们，不止一次找上我的门来。有一次，拉扎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和布罗茨基玩牌，赢了一笔大数目，他请求布罗茨基不再向自己伊尔库茨克的雇员提出任何要求，以此来顶替这笔赌债。叔伯们中最小的一位是列夫，他写诗，并有一个作巡回演出的马戏班。维·什克洛夫斯基认为，继承者不是儿子，而是侄辈，倘若不把这种理论用于文学体裁，而是用于人的话，那么我可以说，我是走上了我叔叔列夫的道路。我还记得，他曾自费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也不算怪诞——《幻想和声音》；这本书里收集了他自己的诗和译自海涅的诗。当时我对诗歌并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喜欢列夫叔叔，因为他不像个体面的亲戚。有一次他给我看几张半裸体姑娘的照片，——他正在为马戏班挑选演员；我的母亲非常生气：怎么能让小娃娃看这些东西？——有一天，在哈尔科夫出现了“爱伦堡马戏班”的海报，拉扎尔·格里戈里耶维奇为了要马戏

班立刻离开这个城市，不得不给了自己弟弟一笔赔偿金。

当我五岁的时候，我的双亲由基辅迁居莫斯科。哈莫夫啤酒酿造厂名义上属于股分公司，实际上归基辅的布罗茨基所有，所以我的父亲谋得了这个厂的厂长职位。

这是1896年的事，到了1903年，布罗茨基决定赶走父亲。母亲噙着眼泪站在办公室紧闭着的门旁倾听，办公室内正开着理事会的年会，父亲坚持要求解除他的职务。我也在那里偷听，可是什么也没听明白——我知道，他们要赶走父亲，现在事情很不妙，而且布罗茨基很固执，可是我突然听见父亲坚决地说，他再也不能在工厂里工作了。这是外交手腕的第一课……

父亲白天工作，晚上也很少在家。间或也有朋友来，我只记得一个——快活的工程师利哈乔夫。有一次在父亲的书房里，我看见了吉利亚罗夫斯基的一本小书，上面的题词写着：“给亲爱的格里·格里留念”。我觉得我父亲过着一种不愿让我知道的有趣的生活。他常到“猎人俱乐部”去，这个名字在我看来很神秘：猎人啦、鹿群啦、猎犬啦。后来我才明白，他们在俱乐部玩“文特”牌，于是我就怀疑父亲的生活是否真的有趣。我十岁上下的时候，他领我到涅格林大街的饭店去；我们坐在单间里，但我不时地跑出去看看大厅里的情况；那儿坐着的全是些普通人，正在大口嚼着肉饼。于是父亲的生活再也引不起我的好奇心了。

母亲是一个善良、多病而又迷信的人；她受着肺病的折磨，衣服老是穿得很多，深居简出，成天忙着照料姐妹们和我，用犹太文给许多亲戚写长信。在最后审判日那天，她一定持斋。母亲在她婆婆周年忌辰的早上燃点的蜡烛，大得使我害怕。卧室里总是弥漫着药味；经常有医生来。母亲要求他们也给我听听——我的肺弱，但是我总是躲起来，跑开了。有时，穿戴华丽的法米利安太太带着她的儿子彼佳和米沙来看母亲；他们彬彬有礼地吃着点心，有时应大人的请求，朗读几段普希金的诗。我认为他们都是傻瓜，可是母亲说：“你瞧，彼佳和米沙是好孩子。可是你呢？……”

我被宠坏了，看来，只是由于偶然的机会，我才没有成为少年犯。我九岁那年，母亲去埃姆斯易地治疗，把我和姐妹们送往基辅，交给她的父亲照管。

外公是一个笃信宗教的老头儿，蓄着一部银色的大胡子。他家里严格